

Bourdieu

世界的苦难

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下)

LA MISÈRE DU MONDE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张祖建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尔迪厄作品

Bourdieu

世界的苦难

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下)

LA MISÈRE DU MONDE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张祖建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张祖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

(布尔迪厄作品)

ISBN 978-7-300-23647-6

I. ①世… II. ①皮…②张…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9550 号

布尔迪厄作品

世界的苦难 (上下)

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张祖建 译

Shijie de Kun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8.5 插页 4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944 000 定 价 138.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致读者 皮埃尔·布尔迪厄 /1

不同观点的空间 /3

皮埃尔·布尔迪厄

水仙街 皮埃尔·布尔迪厄 /6

居无定所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33

各得其所 罗兹妮·克里斯坦 /56

媒体的观点 巴特里克·尚巴涅 /69

自然规律 皮埃尔·布尔迪厄 /87

一个成功融入社会的家庭 巴特里克·尚巴涅 /121

投资失败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137

社区重建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147

最后一条区别 巴特里克·尚巴涅 /165

“一把快刀”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194

场域效应 /199

皮埃尔·布尔迪厄

美国：反乌托邦 洛伊克·瓦冈 /207

“那一带” 洛伊克·瓦冈 /217

艾巴察的流浪汉 菲利普·布尔古瓦 /249

国家撤离 皮埃尔·布尔迪厄 /265

完不成的任务 皮埃尔·布尔迪厄 /273

无诚信的制度	皮埃尔·布尔迪厄	/297
尴尬处境与双重制约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299
“有事可做”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310
国家的观点	巴特里克·尚巴涅	/313
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321
无序的维护秩序者	雷米·勒诺瓦	/324
穷人的警察	雷米·勒诺瓦	/330
女人和警察	雷米·勒诺瓦	/336
明确的指责	雷米·勒诺瓦	/357

正式工与临时工

		/382

	米歇尔·皮亚鲁、斯特凡·波厄	

老工人，新工厂	米歇尔·皮亚鲁	/394
临时工的梦想	斯特凡·波厄	/417
上夜班	罗兹妮·克里斯坦	/442
拥有	罗兹妮·克里斯坦	/460
家庭事务	罗兹妮·克里斯坦、贝尔纳·于拉舍尔	/474
倒霉蛋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480
一个世界的终结	皮埃尔·布尔迪厄	/485
一位代表的困惑	米歇尔·皮亚鲁	/490
来自下面的看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517
作品失窃	桑蒂丽娜·加西亚	/535
无声的见证	罗兹妮·克里斯坦	/560
脆弱的平衡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569
命悬一线	皮埃尔·布尔迪厄	/583
上无片瓦，下不容锥	安妮-玛丽·瓦塞尔	/600
一生虚掷	皮埃尔·布尔迪厄	/631

前途未卜	巴特里克·尚巴涅	/647
家道中落	巴特里克·尚巴涅	/670
大失所望	费德里克·马东迪	/693
职场受挫	路易·班铎	/709

局内的局外人

皮埃尔·布尔迪厄、巴特里克·尚巴涅 /729

当年的好日子	皮埃尔·布尔迪厄	/735
失乐园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762
陷入泥沼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弗朗索瓦兹·厄弗阿尔	/781
双面生活	罗兹妮·克里斯坦	/791
法语课	罗兹妮·克里斯坦	/827
力量对比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832
校园暴力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837
第一代大学生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860

矛盾的遗产

皮埃尔·布尔迪厄

学业历程	阿兰·阿卡德	/885
关于暴力的对话	埃马纽埃尔·布尔迪厄	/909
令人为难的成功	查理·苏利耶	/934
自相矛盾	埃马纽埃尔·布尔迪厄、德尼·鲍达利代斯	/943
光明的绝路	埃马纽埃尔·布尔迪厄、德尼·鲍达利代斯	/965
家庭的梦想	皮埃尔·布尔迪厄	/991
妻子与合作伙伴	让-皮埃尔·法盖尔	/1010
厄运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1029
通讯员	弗朗辛·米埃尔-德雷富斯	/1061

挣脱束缚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1080
患者对象	弗朗索瓦·邦万	/1094
留守老人	罗兹妮·克里斯坦	/1108
孤独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1124

理解

皮埃尔·布尔迪厄	/1136
----------	-------

跋语	皮埃尔·布尔迪厄	/1188
索引		/1193
征引著者索引		/1204

局内的局外人

皮埃尔·布尔迪厄、巴特里克·尚巴涅

如果像人们经常所做的那样，只凭出现于特别是 1986 年 11 月和 1990 年 11 月的两次危机，就大谈“病态的高中”如何如何，这无异于把一种（具体的或精神上的）“现状”不容分说地强加给一个极为多样和分散的社会群体。这个所谓“现状”本身也不够清晰，缺乏界定。的确，学校及其学生群体显然是一个连续体，而且人们通常只根据两种极端的情形去把握它：一种是为了吸纳越来越多的缺少文化优势的学生，在贫寒的市郊成批地匆忙办起的学校，它们其实跟 1950 年以前的中学没有多少共同点；另一种是操持有方的学校，那里的来自良好家庭的学生如今的生活跟父辈或祖父辈没有多大差别。当前广泛存在的“校园病”虽然因怀有同感的学生（或家长）群起抗议，却有十分不同的表现形式。一边是巴黎顶尖中学的优秀学生及其家庭，一边是贫寒市郊的大型住宅区里的职业初中的学生，两边的所忧所虑完全不一样。

914

中等教育制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以前一直很稳定。这种稳定性基于淘汰出自低文化家庭的学生。这个制度施行得很早（初中即开始），相当严酷寡情。由于貌似全凭天资和成绩进行选拔，这种以社会为基础的选拔制度被那些遭到淘汰的孩子和家庭普遍接

受；这些孩子也确信（校方更是这样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必要再跟学业打什么交道。简单明确的学习梯次，特别是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之分与社会等级之分是高度类同的。这种关系深刻影响着那些自认为不适合上学的孩子，他们也自认为不适合教育所开启（或封闭）的社会地位，即白领职业，更不用说那些职业里的领导职务。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很多影响教育制度的变化，毫无疑问，其中后果最严重的是从前有意或无意地被排斥的社会阶层进入了教育体制，如小店主、手工业者、农民（由于义务制教育延长到915 16岁，初中相应地普及），甚至包括制造业的工人。这个过程导致竞争趋于激烈，早就倚重教育制度的社会阶层也加大了教育投资。

关于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人们谈得很多，但有些草率，也带有不少偏见。它的最自相矛盾的后果之一，是穷人们渐渐发现，以“解放思想”为使命的教育制度居然十分保守。确实，经过一段令人想入非非、欢欣鼓舞的时期，新来的受益者逐渐明白，上中学并不能保证毕业，即使毕了业，也不能保证取得从前的一纸文凭——特别是高中毕业证书——便足以取得的社会地位。那个时代，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没上过中学。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在学业上的理由相信，对于教育，特别是影响学业成败的社会因素，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的传播必定有助于学生和家长改变对学校的看法。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对学校的作用已经有所了解。这一切无疑有利于有关教育的主流话语逐渐发生变化。因为，尽管无法避免的失言（如谈到“超常儿童”时），这种话语往往倒退到一些隐藏极深的观点和区分的原则，但教学方法的“圣经”和充满含糊的社会学概念的“武库”——如“社会功能障碍”“文化障碍”或916 “教学方法缺失”——却传播了一个理念：学业受挫不再是，或不仅仅是被排斥者个人的即“天生的”缺陷造成的。于是，在人们的头脑里，集体责任逐步取代了导致“受害者咎由自取”的个人责

任；天资和兴趣等貌似“天生如此”的理由让位于未明确界定的社会因素，例如，学校可用的手段不足，教师无能或能力不够（父母越来越要求他们为成绩欠佳的子女承担责任），以及更难说清的整体有弊端的制度，其机制应当改善。

我们不想鼓励虚幻的决定论（更具体地说，最坏情形的作用），而是觉得，就由新的学生群体构成的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的主体来说，有必要指出学校的效益和相关的社会效益的不同分布如何通过差别的总体转化得以维持。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淘汰过程既然已经在时间上推迟和延伸，而且在延续中被冲淡，长期占据校园的是大批受排斥的学生，他们把自身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带进了学校，使得受教育成了为上学而上学。简言之，危机在校园里间歇性发作，越来越少地受到批评，成了悄悄进行的结构和配置方面的往往是无意识的调整的对对应物。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调整解决了新的社会阶层给中学甚至大学教育带来的矛盾；更明确地说，也更不准确地说——因而也是用更危险的话来说——这些“功能障碍”是实现“民主化”（特别在政治上）的效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917

显然，如果不深刻地改变学位在经济和象征方面的价值（同时至少表面上不使学位持有者面临什么风险），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低下之家的孩子就无法进入教育体系的不同层次，尤其是最高层次。同样明显的是，学位和学位持有者的大量增加导致学位的价值缩水，新移民既是这种现象的直接责任人，同时也是第一批受害者。经过多年的求学生涯，往往在做出大量牺牲后，学生或文化水平低下的家庭才有可能获得一纸贬值的文凭。一旦学业受挫——对他们来说，这种可能性更大——他们必然陷入受排斥的境地，甚至比以前更丢脸，更绝望。丢脸是因为表面上他们有过“自己的机会”，学校可能一度较为周全地明确他们的社会地位；绝望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职位被就业市场名正言顺地留给有文凭的人，事实

918 上也被日益增多的这些人拿走了。这就能够解释，何以连下层老百姓也日益把学业受挫视为一场灾难。所以，无论对于家庭还是学生，学校越来越像一幢令人最终大失所望的海市蜃楼，一块应许之地，恰如天际线，你越是走近它，它就越往后退。

分流的办法与提前定向和选拔程序相结合，有利于造成“温和的”淘汰，即在实行中难以觉察的排斥性做法，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它是持续的和循序渐进的；二是它是不知不觉，看不出来的。对于实行者和接受者都是如此。“温和的”淘汰与“残酷的”淘汰的关系恰如有天资和无天资的交换关系，互为补偿。“温和的”淘汰过程一经拉长时间，经历者就能够将自己的真实情况掩盖起来，或至少有可能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上面自欺欺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出决定性“选择”的时间越来越提前（初中四年级就得做出，从前是在高中毕业会考之后）。学业前途更是很早就锁定了（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近来大规模示威游行何以出现了年幼的高中生）。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看，这些选择的后果出现得越来越迟，仿佛一切都合谋已久，以鼓励和支持高中生和大学生获得“缓刑”，推迟算总账，即真相大白之时，醒悟到上学是一段白白浪费的光阴。

919 学业结束以后，在许多情形下，凭借特别是某些模糊和不确定的社会环境，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会长期持续。由于这些社会环境很难分类，所以给两方面留下的运作余地都更大。这是教育体制与其本应开启的社会空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极为强劲，也隐藏最深——并非无缘无故。因为，学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心理长期失衡的人，这种失衡是多少被压抑的对于学业受挫的体验所导致的，无论受挫是彻底的还是相对的。这些人不得不总是似乎虚张声势地长期维持一个受伤害和残缺的自我形象，既为面对他人，也为自己。即使在最成功的层次，我们也能看到无数这样的相对失败者。例如，普通学校的学生较之于名校学生，名校学生当中排名靠

后者相对于排名靠前者，等等，他们无疑很像帕特里克·苏斯坎德^①笔下的低音大提琴手，他的深重而实在的痛苦源于一个事实：虽然身属特权世界，但一切都似乎在提醒他，他的地位实际上十分低下。

然而，即使有整个教育机制及其控制下的集体防卫体系的支持，压制有关在学校里（或社会上）的地位的客观真相的做法从来就不是很成功的。跟自我欺骗遇到的困境相比，“说谎者悖论”（“我总是撒谎”）根本算不上什么。这一点的最佳注脚恰是一些“缓刑”者的言论，其中既有对于为留在校内而上学的真相的清醒认识，也有几乎是故意地加入这种虚假游戏的决定，目的也许是充分享受学校的自由和无忧无虑。说到底，一个人只要把学校有关他的谎言变成自己的，就必定落入三心二意和双重制约的境地。

920

但是，官方的多样化（通过分科）和非正式的多样化（借特别是现代语言之名，在学校或班级当中巧妙地地区分优劣）同样能收到重建一条区别对待的原则的效果。这是一条特别隐蔽的原则：出身优越的学生能够从家庭获得明确的地位感，每逢拿不定主意时还能获得励志的好榜样和忠告。他们因此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全力以赴，学科对头，学校对头，班级对头，等等。与之相反，来自最贫困的家庭的学生，尤其是移民的孩子，往往难逃自生自灭的命运，从小学后期开始，他们就听凭校方的诫令和偶然性的摆布，只为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出路。他们被迫不合时宜地和逆向地运用自己的已经很微薄的文化资本。

这里涉及的是文化资本的传承以外的诸多机制之一，它导致水平最高的学校，尤其是那些向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位置开放的学校，

921

^① 帕特里克·苏斯坎德（1949—），当代德国剧作家和电影编剧。《低音大提琴》是1981年上演的他的话剧。剧中主人公有大段反映失意者矛盾心态的自嘲，既愤世嫉俗，又无可奈何。——译者注

能够跟过去一样继续鹤立鸡群。这个教育体系既面向所有人，又为一部分人有所保留，它的绝招是把“民主化”的表面现象与再生产的现实结合起来。这种再生产完成了高水平的掩饰，同时也取得了在社会上合法化的更佳效果。

但是，这种调和对立面的做法不会不引起反响。教育制度的矛盾，一种强加于与之不相适应者的新形式的暴力，二者的持久效果明显体现为高中学生近20年来不断举行的各种抗议示威，以及条件最差的校园里频发的各种暴力行为。

922 一如既往，教育制度总会有所排斥，但是，排斥如今在课程的各个层次不间断地进行（过渡性班级与职业学校之间也许只有程度的分别），同时在制度内部给被排斥者保留空间，把他们打发到可有可无的教学分支机构去。这样一来，根据制度的变动、摇摆和惩罚的不同，这些内部的弃儿被迫在依旧惊羡地相信教育体制所描述的幻象和服从校方的裁决之间，在不无焦虑的服从和无力的反抗之间寻找平衡点。他们很快就发现，有些字眼——如“中学”“中学生”“教师”“中学课程”“高中毕业会考”——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事物；学校和学科方向把他们汇集在一个最低下的地位；他们正在攻读的文凭其实是不值钱的（“我只是一张小小的会计证。”其中一人说道）；他们取得的高中毕业会考的成绩如果没有必不可少的奖掖之辞，他们就只能走上一条有名无实的高等教育之路，此后也是如此。由于学校判定他们放弃学校本身曾经启示他们的学术追求和社会追求，而且，一言以蔽之，迫使他们降低身份，他们只能明知学业没有前途，仍旧无精打采地混日子。皮革书包、整洁的校服、尊师重道的时代已经过去，平民子弟归附学校的一切象征如今已经被一种更疏远的关系取代：失望之下的屈从就范伪装成满不在乎的懒散放任；文具故意缺这少那；懒洋洋地肩挎用线绳或橡皮筋绷住的文件夹；毡芯笔取代了当年的贵重钢笔——那是在

生日等场合下得到的取得好成绩的鼓励。屈从也表现在针对教师的挑衅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在课堂上也要听随身听，故意穿着随便，衣服上常常印着时髦摇滚乐队的名字，圆珠笔和毡头笔上也常见这些名字。这些都提醒人们，“真实的世界”其实在学校以外。

借助充斥日常话语的先于逻辑的思维捷径，也出于对戏剧化或惊人之谈的嗜好，喜欢谈论“高中病”的人把它跟“问题郊区”——本身也受到“移民”幻象的影响——联系起来，从而在不知不觉之中触及了当代社会的最根本的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在一个无疑比以往更重要的教育体系的运行当中特别突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这个矛盾也是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个制度日益强烈地倾向于为所有人倾其所有，尤其是在物质财富和象征手段财富的消费方面，甚至包括政治财富，然而一切都是在仿冒制品的虚假外表之下进行的，似乎只有这样，一部分人才能切实和合法地独占这些财富。

923

当年的好日子

925

马利克年方十九，可是“阅历不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从事一份无薪实习的工作。他既不抱太多的幻想，也得不到多少训练。为了满足一所排名很低的郊区高中的要求，他自己找到了这个实习机会。那些要求是针对一个不伦不类的专业的学生制定的。他跟父亲一起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父亲几年前离了婚，至今未娶。马利克定期去他的“保障房”探望母亲。他依旧怀念那里，怀念那里和睦的氛围，以及他所说的“有福同享”。也许在快乐的外表之下，他仍然怀念自己家庭的团结，有时候他似乎要用肩膀扛起所有的分量，对于一度成为榜样的哥哥，他的感情很复杂。他仍然很爱哥

926

哥，他从来没有真正对哥哥予以谴责，可是责备哥哥对父亲太冷漠，父亲已经被哥哥的不良行为伤害不浅。谈起父亲，马利克表现得十分宽容和理解，他解释说，父亲的恐惧和严肃性既过分又徒劳无益，那是他的“出身”造成的，同时出于一种能够被承认和融入社会的愿望。马利克竭尽全力保护父亲，而且——如果用这个词不太过分——对他进行再教育。马利克既要面对这个被拔了根的、不合拍的、被剥夺了父权的基础的男人，又得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此时马利克所承担的责任，连同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恐惧，使他迫切地渴望稳定，也导致他试图长期保持高中生的身份，这种身份尽管是暂时的和不确定的，但总算比较舒坦。他似乎沿着两个不同的时间轨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向我们讲述他的生活，但无意调和二者：先从学校的角度，后从他度过童年和部分少年时期的“保障房”的角度。这是两个独立甚至对立的世界，也是两种记忆，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

927

他的神情举止、装束，乃至语言，都给人一种十分自如的感觉，这无疑跟他的体态的魅力有关，他不可能全然不知。不过，我们也觉得他脆弱和不稳定，正像差劲的心理学教科书有时所说的那样。他坐不住，似乎总得起来走动走动。这证明了柏柏尔人把青春比喻为春天的神话：进退交替；晴雨、冷暖交替。他不停地在近乎天真的漫不经心和深重的焦虑之间变换。说着说着，他有时会失去思路，有点过分明确地表示忧虑。对此他似乎已经习惯，而且为之自责。采访一开始，经过长久沉默后，他说“找不到词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又不耐烦地说，他把“另一个词儿也忘了”。他竭力高声给自己鼓劲，好像在下赌注：“不，我不能卡壳，不能卡壳。”他两次都在搜寻规范的课堂用语——“求职技巧”“实习规范”。仿佛重温校方的评语似的，他说他读书很吃力〔“我做不到。读起书来，过不了一会儿就得放下，因为有别的事，不然我就能找

到需要的东西。不错，书里确实有说不完的了不起的东西（口头承认学科的价值），可是那就得活得像个隐士，有个藏书屋，才能做这个”]。他自责没有想清楚（“是我弄混了，告诉您吧，我告诉您的是一笔糊涂账”），他有时候会陷入混乱，也许是采访的情境唤起了他在学校的体验，他被吓蒙了，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他时而把必要性说成美德，时而把犹疑不定说成有意做出的决定：“我觉得我必须……逃脱……不分时间地逃脱，可是关键是逃脱，这比别的都重要，嗯，这个……我有……非这么做不可，我不喜欢稳定。我要它动起来，得有点动静才行，得有点什么事。”抑或：“这么说吧……哪儿都一样，实习的时候我这种个性也能看到。我去实习的每一家公司，我都得琢磨琢磨，我要它与众不同。”一切都令人相信，他在校内外结成的关系（他的朋友，以及一个在他的中学里教书的他心仪的年轻女子）被他用来制造一种山寨版的艺术家生活（这一点当他叙述在西班牙度假时尤为明显，此处未发表）：928
“当上总裁，眼睛不再盯着女友……不看了……没兴趣了……”

事实上，无论是工作、家庭、学校，还是友谊，他的整个生命都带有不稳定和不断变化的标记。马利克的父亲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特莱姆森（Tlemcen），在马利克出生以前不久来到法国，多次改换工作和公司。“父亲换过好多工作，他曾经……我想一开始是当……修车师傅，修理轻型摩托车什么的。后来也干过别的，然后当钻工，在一家企业里当钻工，他在那儿待的时间最长，后来企业倒闭了（……），他又找了一家，后来也倒闭了。再换一家，他不得不东奔西跑，直到现在还是……”不仅马利克的父亲不断变换地点，他的母亲，一位南斯拉夫移民，也先后在一家（提供住处的）游泳池和一家大百货公司当过收银员，正如他说的，“家搬了又搬，学校换了又换”。

这是一种深感当下和未来都不确定的体验。“保障房”社区的

动荡生活无疑扰乱了学业，失望情绪使这种体验倍加沉重：做出一些“蠢事”的动机只是“闹点动静”，也为了跟大龄孩子混在一起，包括从他12岁起就带他去夜总会的大姐及其更年长的好友们，以及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在一次持枪抢劫之后，他的不断升级的“蠢事”（“越干越大，越干越多”）和对金钱的需求最终把他送进了监狱。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正如同样无法把握现在和未来的赤贫阶层，他何以只能尽量延长这种不确定状态的时间，尽管这种状态恰恰不允许他把握时间（“总之，说实话，我们在学校里挺享受的。”“总之，这是我选择的路，这样就能在学校多待一阵子。”）；我们也能理解，他何以把极端的现实主义与风险极大的空想掺和在一起。一方面，他大言不惭地提出怪要求（往往笑着或露出浅笑）：“请注意，我的要求很高。我要的工作必须让我完全满意！”他在访谈结束前甚至抛出了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计划，一个千禧年神话，跟两个同样懵懂的朋友一道拟定：奔赴一个从未去过的远东国家，在那儿创办一家类似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社，但是以亿万富翁为对象。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地申明，他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上的是一所“垃圾中学”（只用三言两语，他就使我们懂得了他如何很快想通了学业受挫的原因：他发现，坐在前后排的同学跟他是一路人）；他还谈到毕业证书，称之为“死胡同”。他表达了一个幼年以来从未放弃的愿望：不顾一切地离家出走。可是，他在结论里却承认了这通漫游梦所否定的现实：“说来说去，有一件事我敢肯定：我会留下来。不过，我眼下不这么想。”

谈到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很划算的交换理论（“学校里没人要求我得高分……只要过得去就行了”），这就似乎使得在有保障的学校里最经济地存活的艺术显得合情合理。这无疑是他的“智慧”的最佳说明：这种存活艺术的主要益处是不仅能尽量推迟进入社会生活的的时间，特别是尽量避开进“工厂”的恐惧——从适应学校生活